

的編者

把握修史機會

促進思想交流

目前中國政府正在進行國家清史纂修工作，其中宗教及中西文化交流等環節，將涉及大量與傳教士相關的歷史研究。這方面的發展，值得我們深切注意。

開發對清代傳教士活動的探討，為研究清代宗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來說，有著極深遠的意義。作為天主教研究機構，我們珍惜這次機會，冀能在纂修清史的過程中，重新梳理教會對當時歷史的理解，好使教會及中國社會雙方能對這段歷史有全面及更客觀的認知。

為了促進國內外學者對清史與傳教士來華活動關係的研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於十月下旬在北京香山合辦了一次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廣邀海內外的學者出席交流對清代傳教士歷史文獻的研究工作。筆者有幸躬逢盛會，並就香港教區的檔案素材對清史研究的作用，作了概要的演說。

也許在讀者心目中，會感到香港孤懸於南海一隅，對清史研究能作的貢獻不會太多。但在多番研讀教區檔案館的資料之後，筆者相信香港教區實有不少機會出一分力。

香港教區的地理位置及歷史位置都有其獨特之處，與清代的地理及歷史有一定的重疊。香港天主教會最早於一八四一年以監牧區的身份出現，與清代歷史有七十年的相遇；地理方面，香港監牧區包涵港島以外，尚包括在廣東省的新安、惠陽（當時稱「歸善」）及海豐三縣，地理上的重疊亦實在不少。更何況，在羅馬教廷眼中，從來未將香港置於中國之外，即使一九四六

年中國聖統制成立，香港亦列為廣東教省的一員。可見香港教會與大陸腹地一直是血脈相連。

除了上述的地理及時間重疊的因素外，筆者認為香港教會對清史研究別有意義，原因出於兩方面。第一，基於政治氣候的因素，在清末許多天主教重大事件，都在香港舉行。即以一八八零年至一九零九年舉行的分區主教會議為例，教廷因應中國教會的迅速發展，於一八七九年成將全國教務分為五大區域，香港屬於第五區。教廷同時要求各區的主教聚會舉行地區會議，香港有幸成為第五區的會議主辦地。有關該次會議的主要文件（基本上以拉丁文為主）均存於香港教區檔案館。這些資料，成了研究清末社會民生的重要資料。

第二，由於政府轉易的問題，中國大陸上大部份教區檔案館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遭到十分嚴重的破壞，資料散佚不少。香港教區檔案館有幸保留下來，對這一環節的補充，別具價值。

當然，筆者亦要特別提到，毗鄰香港的澳門教區，所傳的資料比香港更豐富，年代更加久遠，而與清代的關係更見密切，能作出的貢獻肯定更多。因此，筆者借此機會呼籲身處澳門及香港的教會內弟兄姊妹攜手合作，為中國歷史與天主教史的交談，作出別具意義的一份貢獻。

將臨期內，祝願各位讀者常沐主恩，與主同行。

林瑞琪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